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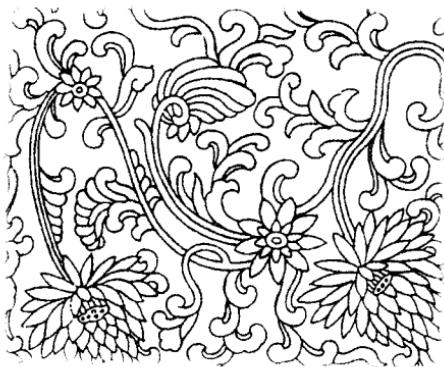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

Tangdai Fojiao Dili Yanjiu

李映辉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

Tangdai Fojiao Dili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李映辉著 一长沙 湖南大学
出版社 2004 4

ISBN 7-81053-753-9

I 唐 II 李 III 佛教—地理分布—研究
—中国—唐代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1430 号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

Tangdai Fojiao Dili Yanjiu

李映辉 著

责任编辑 肖立生
 特约编辑 兰甲云
 封面设计 张毅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码 410082
 电话 0731-8821691 0731-8821593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装 湖南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32开 印张 10.75 字数 270 千
 版次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1053-753-9/B 25
 定价 20.00 元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向承印厂调换)

序

朱士光

李映辉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佛教地理研究》，在他获得博士学位后经历了8年的充实修改，终于要付梓刊布了，我得知这一讯息后深为之感到高兴！因为此前，尽管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在他们撰写的有关佛学或佛教史的论著中涉及佛教地理分布问题，甚或专门写过佛教地理的著作，但都还只是关于佛教地理单一要素与静态的论述，与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论述的历史时期或某一历史阶段佛教或其相关要素之地理分布及其演变的历史佛教地理学论著虽有一定关系，但却有相当大的不同。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进行研究，虽然我国大陆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文科学的复兴，作为历史人文地理重要分支学科之一的历史宗教地理也日趋活跃，其中又以历史佛教地理成果最为丰硕，笔者也曾于1990年8月撰写过《试论中国佛教与历史地理研究之关系》一文（刊《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但或为专题论文，或是在有关历史文化地理的著作中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进行论述，所以作为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佛教地理学的专著出版，这尚是第一部。这无疑对推进历史佛教地理学乃至整个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会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实际上对这部论文作如此评价并非我之溢美，1996年5月

28日，在映辉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提交答辩的会议上，5名答辩委员在肯定了论文最明显的特点是论点建立在丰富、扎实的佛教史籍及金石文字资料基础上，同时又进行了科学的计量分析，并结合时代特点与各种因素的影响进行周密论述，因而结论是科学的可靠的之后，又指出论文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不仅对于历史文化地理的学科建设，对当代宗教地理、中国佛教史、中国历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和学术意义，而且也有益于今日宗教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所以论文获全票通过。由此可见，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还具有具体的应用功能。

映辉博士在去年除夕给我的信中对他这部论文延迟数年才出版深怀愧疚之情。但我认为，现在出版应该说条件更为成熟。一是此前数年中，映辉博士从1997年至今，不断对论文中一些问题再作深究，先后撰写了十余篇论文，陆续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宗教》、《生态环境与保护》等专刊转载，已在历史地理学科之外更广泛的学术领域造成影响；二是通过几年的冷静深长思索，对全部书稿又作了全面细致的充实修改，特别是作为全书核心的第六章“综论唐代佛教地区分布及其变迁”用力更多，使这一章较原稿更为清晰地反映出唐代各地区佛教发展的时空轮廓，也更为充分地反映出各地区佛教宗派的发展状况。所以我认为现在出版这部专著，将更能体现它的价值与作用。映辉博士无愧于自己的执著努力，也无愧于师长与学界同道。倒是我，去年底本已承诺为他这部新著写序，却因今年二、三月间应邀赴日本进行短期访学，归国后又诸事缠身，迟至今日方握笔成篇，且仓促间未能尽意，实有辱所托。幸赖读者诸君自有慧眼，当会见仁见智各有所获。

2004年3月26日

目 次

序	朱士光 (1)
绪 论	(1)
一、研究唐代佛教地理的意义	(1)
二、唐代佛教地理的研究现状	(3)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	(5)
第一章 唐代高僧籍贯分布	(7)
一、高僧籍贯分布的轮廓	(7)
二、高僧籍贯分布及其变迁	(11)
(一) 唐前期高僧籍贯分布	(38)
(二) 唐后期高僧籍贯分布	(43)
(三) 来华外国高僧的籍贯分布	(48)
三、唐代西行求法高僧的籍贯分布	(49)
第二章 唐代高僧驻锡地分布	(53)
一、高僧驻锡地分布轮廓	(65)
二、高僧驻锡地分布及其变迁	(66)
(一) 唐前期高僧驻锡地分布	(66)
(二) 唐后期高僧驻锡地分布	(70)
三、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异	(75)
(一) 唐前期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异	(76)
(二) 唐后期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异	(80)
第三章 唐代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	(85)
一、佛教史传等文献中所见寺院的地理分布	(87)

(一) 唐前期寺院的分布	(87)
(二) 唐后期寺院的分布	(92)
二、石窟寺的地理分布	(97)
(一) 唐以前石窟寺的地理分布	(98)
(二) 唐代石窟寺的地理分布	(123)
第四章 唐代佛教石刻的区域分布	(141)
一、佛教石刻及其分布概述.....	(141)
二、唐前期佛教石刻分布.....	(146)
三、唐后期佛教石刻分布.....	(147)
第五章 唐代佛教学术的时空差异	(150)
一、佛教译撰著作的地理分布.....	(150)
(一) 唐前期佛教著作的分布	(154)
(二) 唐后期佛教著作的分布	(157)
二、唐代佛教义学之风尚及其地理分布.....	(159)
(一) 唐前期佛教义学风尚及其分布	(159)
(二) 唐后期佛教义学风尚及其分布	(176)
第六章 综论唐代佛教地区分布及其变迁	(180)
一、综述佛教各要素之分布.....	(180)
二、唐代佛教地区分布及其变迁.....	(181)
(一) 唐代前期佛教的地区分布	(182)
(二) 唐代后期佛教的地区分布	(240)
第七章 影响佛教地理分布的因素	(290)
一、自然地理条件.....	(290)
二、经济条件.....	(293)
三、人口条件.....	(297)
四、交通条件.....	(301)
五、政治条件.....	(304)

六、历史条件：唐以前佛教基础及其影响	(308)
附录 东晋至唐代衡山佛教的发展	(311)
附 表	

表 1-1 唐代前期高僧籍贯分布表	(12)
表 1-2 唐代后期高僧籍贯分布表	(28)
表 1-3 唐代前后期高僧籍贯分布对比表	(44)
表 2-1 唐代各地主要弘法高僧名录	(54)
表 2-2 唐代高僧驻锡地分布表	(61)
表 2-3 唐代各道所出、所居高僧比例表	(76)
表 2-4 唐前期各道所居高僧籍贯之地区构成	(77)
表 2-5 唐后期各道所居高僧籍贯之地区构成	(81)
表 3-1 史传等文献中所见寺院之分布	(88)
表 3-2 部分州(府)会昌法难前后文献中所见寺院 数量	(95)
表 4-1 唐代各地佛教石刻数量	(142)
表 5-1 唐代各地所出佛教著作统计表	(152)
表 5-2 唐代前期高僧弘阐佛书统计表	(160)
表 5-3 唐前期各地弘扬义学高僧人次统计表	(175)
表 5-4 唐代后期高僧弘阐佛书统计表	(177)
表 5-5 唐后期各地弘扬义学高僧人次统计表	(179)

附 图

图 1-1 唐各道高僧籍贯分布及前后期比例图	(322)
图 1-2 唐代前期高僧籍贯分布图	(323)
图 1-3 唐代后期高僧籍贯分布图	(324)
图 2-1 唐各道高僧驻锡地分布及前后期比例图	(322)
图 2-2 唐代前期高僧驻锡地分布图	(325)
图 2-3 唐代后期高僧驻锡地分布图	(326)
图 3-1 唐前期文献中所见寺院分布图	(327)

图 3-2 唐后期文献中所见寺院分布图	(328)
图 5-1 唐前期佛教著作分布图	(329)
图 5-2 唐后期佛教著作分布图	(330)
图 6-1 唐前期佛教发达区域与佛教兴盛地	(331)
图 6-2 唐后期佛教发达区域与佛教兴盛地	(332)
后 记	(333)

绪 论

一、研究唐代佛教地理的意义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任何一种宗教的形成、传播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空间范围，受到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宗教一经形成，就会反作用于地理环境，并成为地理环境的组成部分。宗教地理学就是要探讨一定文化地域中的宗教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宗教的传播、发展不仅具有地域性，同时又是一个历史过程，具有明显的时代差异。探求历史时期宗教发展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阐述当代宗教区域差异的历史成因，这是历史宗教地理学的任务。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发展到唐代进入鼎盛时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佛教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又具有强烈的区域差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因此，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唐代佛教地理，就显得很有意义。

历史文化地理学是应该包括历史佛教地理的。现在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历史佛教地理又是其中最薄弱的分支之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历史文化地理学乃至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就唐代而言，许多地理现象（主要是人文地理现象）区域特征的形成、发展，都与佛教有联系，毫无疑

问，唐代佛教地理的研究，当有助于唐代文化地理和唐代地理的研究，也有助于对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状况的了解。此外，当代的佛教地理现象植根于历史时期的佛教地理现象，所以开展历史时期的佛教地理，特别是佛教极盛时期的唐代佛教地理的研究，对于当代佛教地理的研究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就不能不研究佛教，否则，就写不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近年来，佛教史的研究已蔚然成风，成果甚夥。这方面的著作中也会涉及一些地区佛教发展状况，但受学科性质的限制，往往只是泛泛而谈；或者就是区域佛教发展史。然而，佛教的发展历史与不断变化的地理条件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离开地理条件，许多佛教历史现象就解释不清。探讨唐代佛教传播、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其成因，对于唐代佛教史甚至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它可以为佛教史的研究架起一个比较清晰的空间结构，并使之更加丰富、更加深入。

佛教景观（寺院、石窟、石刻等）是现代重要的旅游资源。充分利用、开发这些旅游资源，有许多工作要做。历史佛教地理在这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举例来说，人们乐于称道的石窟寺，大多分布在北方地区，南方却少见，这是什么原因？气势宏伟的敦煌石窟是如何形成的？云冈和龙门石窟又有何不同？西安的大雁塔，洛阳的白马寺，凤翔的法门寺，广州的南华寺，还有四大佛教名山，等等，它们各自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内涵是什么？通过历史佛教地理的研究，就可以把这些景观形成的时空背景展现出来，回答上述类似的问题。这无论是对旅游管理和经营部门，还是对于广大的旅游者，都是非常有益的。这是历史佛教地理研究在实践方面的意义之一。

二、唐代佛教地理的研究现状

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在国外开展得相对早些，不少人从宗教生态学、宗教的时空分布等角度进行了研究，发表出版了有关文章和专著，美国西拉库斯大学索佛尔教授（David E. Sopher）的《宗教地理学》一书便是其中的力作^①。日本学者对中国的佛教地理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并上以智为撰《六朝时代佛教之分布》^②；山崎宏的《支那中世佛教の展开》，统计了《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的737位高僧的驻锡地，区分隋唐佛教发展为各种干线、支线、地方群等^③；滋野井恬所著《唐代仏教教线の检讨》，在山崎宏研究的基础上，列出初唐（627—677）及雍州地区的高僧分布，其特点在于增加高僧的原籍地，且配合历史事实作探讨^④。我国的宗教地理学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比较少。在佛教地理方面，建国以前，只是在少数佛教史学家的一些著述中对佛教入华路线、初期佛教的流布范围有所论述，如梁启超的《佛教与西域》、《又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⑤；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⑥ 和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⑦的个别章节，与佛教地理稍近。正式以佛教地理为名的是1943

① 参见李锐铮《试论宗教与地理学》，刊《人文地理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② 参见朱士光《试论中国佛教与历史地理研究之关系》，刊《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③ 东京，清水书店，昭和二十二年。

④ 滋野井恬：《唐代仏教教线の检讨》，载于氏著《唐代仏教史论》页24—70，日本平乐寺书店，昭和四十八年。

⑤ 《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

⑥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

⑦ 《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

年出版的刘汝霖著《中国佛教地理》，该书分《名都》、《名山》、《地方》三卷，对一些著名都会、重要城市和名山的佛教发展历史，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文地理学遭受冷落，宗教地理学更是无人敢于涉足，以至于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分册中，宗教地理学竟然未能占据一席之地。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人文地理学的重建，宗教地理也开始受到注意，一些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佛教地理方面，有朱士光的《试论中国佛教与历史地理研究之关系》^①，台湾何启民的《佛教入华初期传布地理考》^②，张伟然则相继发表了《东晋南朝时期湖南佛教的流布》^③、《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④。也还有一些研究局部地区佛教发展历史的论文，而韩溥则出版了《江西佛教史》^⑤。

关于唐代佛教地理，有曹尔琴的《唐长安的寺观及有关的文化》^⑥，辛德勇的《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⑦、《长安城寺院的分布与隋唐时期的佛教》^⑧，张弓利用晚近方志资料撰《唐代佛寺群系的形成及其布局特点》^⑨，又有香港严耕望的《唐代佛教之地理分布》^⑩，李洁华的《唐宋禅宗之地理分布》^⑪等。张伟然

① 《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

③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6期。

④ 《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1991年第4辑，1992年第1辑。

⑤ 韩溥：《江西佛教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

⑥ 《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⑦ 《唐史论丛》第4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

⑧ 《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⑨ 《文物》1993年第10期。

⑩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

⑪ 《新亚学报》1980年第6期。

在《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① 和《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② 两书中安排专章分别论述了湖南、湖北历史时期的佛教地理。此外，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两位日本学者的著作。严耕望文是用《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对高僧驻锡地作简单的统计，来阐明唐代佛教的地理分布，并根据法相宗、天台宗、禅宗、华严宗等祖师的籍贯、驻锡地，简要分析了此四宗的地理分布。严文在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上具有开创之功，惜乎篇幅太短，没有充分展开，未免失之疏简。辛德勇文在严文基础上，推而广之，考察了唐高僧籍贯和驻锡地分布及其变迁，论述比较全面细致，剖析亦堪称深邃。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些成果或者在研究内容上不够全面（一些唐代佛教地理的重要要素被忽略）；或者在地域上限于局部地区；或者主要运用历史学方法，缺少地理学意义。总之，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完全开展起来。这是与发达的唐代佛教不相称的。本书将努力使这项研究工作前进一步，以期填补这一空白。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七章。佛教有所谓“三宝”之说，僧人即“三宝”之一。因此，本书第一、二两章首先选择高僧作为研究对象。采取了不同于严耕望、辛德勇等的研究和统计方法，对高僧籍贯和驻锡地分布及其变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勾画出了唐代佛教地理的基本轮廓；并且在第一章第三节探讨了西行求法高僧的籍贯分布及其原因；而在第二章第三节分析了唐代前后期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异情况，这对于深入理解高僧驻锡地分布及其变化很有

①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 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帮助。佛教寺院是僧人从事法事活动、传播佛法的重要场所，也是僧侣生活居住的地方，寺院的分布能够很好地反映各地区佛教发展的差异，故第三章以寺院为研究对象，第一节讨论了一般所说寺院在唐前后期不同的分布特征；第二节阐述石窟寺的地理分布。因为唐代大多是在唐以前所开的石窟内或在其旁近继续开窟造像的，所以先追溯了唐以前石窟的地区分布，然后论述唐代石窟的地理分布情况，详细阐述了石窟分布及变化的原因。第四章探讨了佛教石刻在各地分布的多寡差异，从而显示各地佛教活动的兴衰历程，特别是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之间佛教信仰行为的差异。佛教重视宗教仪式、宗教实践，同时也十分重视理论建设。本书第五章通过各地区所出佛教译、撰著作的多少和唐代佛学界流行佛书在不同地区弘阐的差异两个方面，探讨了佛教学术的区域差异及其变迁。第六章《综论唐代佛教地区分布及其变迁》，是以高僧籍贯、驻锡地和寺院等定量指标为基础，参照石窟、佛教石刻和佛教学术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广泛征引各类描述性的文献资料，进行区域的综合研究，论述了唐代佛教的发达区域、佛教兴盛地和一般地区的佛教发展情况，以及它们的变迁。最后一章则讨论影响唐代佛教地理分布的因素。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是一个大课题，内容复杂，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很多，又无先例可援，以笔者的学力、精力、时间等各种主观客观条件而言，实难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本书对已涉及的问题仅仅做了些初步研究，有些问题（如唐代佛教宗派的地理分析）还没来得及讨论，这都有待于将来继续努力。

第一章 唐代高僧籍贯分布

佛、法、僧是佛教的三宝。其中僧即指僧人。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僧尼数量是非常多的。唐高祖时，傅奕说大唐丁壮僧尼 20 万众，而道宣于唐高宗时所作的《广弘明集》卷 7 驳之曰：大唐寺籍，佛、道二众不满 7 万。据《法苑珠林》卷 100，高宗时僧数为 6 万余人。开元中，令天下三岁一造僧籍，其结果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据《新唐书·百官志》，玄宗时僧 75524 人，尼 50576 人。又据《旧唐书·武宗纪》，武宗毁法，还俗僧尼就多达 26 万余人。但是，这些僧尼在全国的分布，我们已无从查考，能够为我们所利用的就只有当时高僧的材料。唐代近三百年间，高僧大德，先后辈出，考察他们籍贯的地理分布，是揭示唐代佛教地理分布特征的重要途径。本章依据《大正大藏经》本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唐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宋贊宁等撰《宋高僧传》^①，对唐代高僧籍贯分布及其变迁进行全面的统计和分析。

一、高僧籍贯分布的轮廓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博士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

^① 《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大正大藏经》卷 50；《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正大藏经》卷 51。本书以下引上三僧传，版本同。

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① 生长、生活其中的文化环境对个人的文化习惯、文化信仰的影响是如此之大，那么一个地区民众信仰佛教与否、信仰程度之高低，也就可以由该地区所出僧人数量、高僧数量反映出来。

前述三《高僧传》记述高僧籍贯的方式，有三种情形：（一）僧传中直接称某僧为“某地人”，或某僧“生于某地”，这就是直接道明了该僧的籍贯。但是，有时在行文中称“某地释某”，那就不见得是指该僧的籍贯。如《宋高僧传》卷2《释大川传附法炯传》说：“闽城法炯者，未详何许人。”闽城显然是驻锡地。又如《宋高僧传》卷29《释皎然传附福琳传》云：“唐黄州大石山释福琳，姓元氏，荆州人。”黄州无疑也指驻锡地。不过，“某地释某”这样的说法，有时也还确实指的是籍贯，这就得仔细予以甄别。例如，《宋高僧传》卷14称“淄州名恪律师”，根据文义可以判断淄州是名恪的籍贯。（二）僧传中称某僧“其先居甲地”，或“本甲地人”，后“迁”或者后“寓居”乙地者，本书统计时一律以乙地为准。（三）僧传中没有明说某僧籍贯，然而根据文义可作比较准确的推测。例如：《续高僧传》卷14《释慧瑜传》说瑜“三岁二亲俱丧，养于舅氏。五岁随外祖往（荆州）长沙寺……不肯还家，遂住之为寺救苦法师弟子”。一个三岁幼童父母早故，往依荆州舅父，他童年所受影响无疑来自荆州的社会文化环境。即使慧瑜出生地不在荆州，把他看作荆州人，也应不

^①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著，何锡章等译：《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页。